

## 论 文 提 要

丰富的历史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汲取我党历史上总结经验的经验和教训，学会科学地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本文以1945年和1981年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为典范，以历史上不正确总结经验的教训为鉴戒，以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论述为指导，探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规律、方法和一般原则。

一、总结历史经验的出发点是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弄清思想的最高要求是弄清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此，总结经验宜粗不宜细。

二、全面的高水平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总是在特定的领导集团主持下进行的。所以，总结历史经验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正确领导的主持下，依靠健全的民主制度进行。

三、总结历史经验大体可分为面对紧迫任务，为了寻找

---

对策而进行的局部性总结，和为了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而进行的全局性的总结。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把握好总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步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四、总结历史经验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尊重历史史实，保持总结的客观性；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必须实行辩证分析，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防止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五、总结历史经验，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同时情感、个性特征等非理性因素也发生作用。必须防止和排除非理性因素的消极方面的影响，总结历史经验的活动才能健康地顺利地进行。

## 关于我党总结历史经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已经70年了。7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丰富的历史经验是党的事业的宝贵财富，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总结经验，党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解，逐步掌握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在政治上日臻于成熟；通过总结经验，党对领导骨干和广大党员进行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端正思想路线；通过总结经验，党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缩短探索的过程，减少曲折和失误，使革命和建设尽快走上坦途；通过总结经验，全党在事实的对比中辨别是非正误，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确立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权威。党的70年历史是一部在不断总结经验中探索前进的历史。

党的每一步实践，都在总结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不是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就是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不是自觉地汲取经验，就是盲目地汲取经验。在党的历史上，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成功典范，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45年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81年决议”）。45年决议，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成功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三次“左”倾路线的教训，使党在七大达到政治上的完全成熟、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决议后仅四年时间即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81年决议，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

全会政治转折的基础上，正确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的经验教训，顺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为进一步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打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在党的历史上也有过由于不能正确总结经验，而导致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面前，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左”倾路线的错误，反而越陷越深，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白区工作几至荡然无存。五十年代后期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虽然在实际行动上采取了许多纠偏的措施和步骤，但始终不能从指导思想上汲取教训，脱摆“左”的困扰，终于导致十年文革的空前浩劫。

可见，能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汲取党在历史上总结经验的经验教训，学会科学地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大深远的意义。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以1945年和1981年党的两次历史问题决议为典范，以历史上不正确总结经验的教训为鉴戒，以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关论述为指导，探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规律、方法和一般指导原则。

### **一、总结历史经验的出发点是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两个决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总结历史经验，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具有明确的目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1944年，在全党高级干部讨论党史时，毛泽东同志根据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处理历史问题即总结历史经验，应“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sup>①</sup>邓小平同志在关于起草81年决议的意见里指出：应该“使这个决议

（指81年决议）起到象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②

“向前看”，是总结历史经验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同志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说：“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又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全党，为全党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③总结历史经验，就其形式来说，是对以往历史事件和党的实践进行再认识，是“向后看”。但就其实质和目的来说，是为了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是向前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向前看是共产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的表现。有了向前看的态度，为了党的未来发展，就能出以公心，排除干扰，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如果抱着向后看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就会沉缅于过去，或者骄傲自满，或者消极悲观，或者纠缠于历史细节和个人恩怨而不能自拔，既不利于弄清思想，又不能团结同志。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弄清思想，而弄清思想的最高要求是弄清党的指导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45年决议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回顾，通过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对比，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代表，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达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在起草81年决议时，邓小平同志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原则，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④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

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确立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是一致的。81年决议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并将继续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破除了个人崇拜，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并加以发展。而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失误，则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给予毫不含糊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由于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总结了经验教训，确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前进有了坚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有了更坚实的基础。这是81年决议的最大贡献。经过80年代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剧变，更加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按照“向前看”的原则，对待历史问题应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在起草81年决议时，邓小平同志说：“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

“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⑤宜粗不宜细地做基本总结，就是弄清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基本的历史脉络，分清路线的大是大非，揭示基本的历史经验，而不纠缠于历史细节、具体事件和个人恩怨。当然，这里所说的“粗”，决不是粗糙、粗率、粗疏，而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它要求从宏观的高度，对历史问题进行提炼、概括。因此，粗实质上是精，是历史的升华，是认识的飞跃。

弄清思想和团结同志，是“向前看”的基础。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在对待历史问题时，必须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有惩前才能毖后，治病才能救人。惩前和毖后，治病和救人，手段和目

的不可偏废。因此，一方面，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应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内容和改正错误的办法，避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又不过份着重个人的责任，在人的处理上采取宽大的方针，以便能够团结更多的同志共同工作。针对历史上过左的党内斗争偏向，毛泽东同志着重强调：“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⑥

## 二、总结历史经验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正确领导的主持下，依靠健全的民主制度进行

全党范围的总结经验，作为对群众分散的实践经验的集中，作为认识过程的飞跃，总是由一定的历史人物，即党的最高领导层（或称之为领导集团）来完成的。对全局性历史经验的深入总结，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只有站在一定历史高度、统览全局的人，即只有领导集团才能做到。所以，全党范围的历史经验总结，总是在特定的领导集团的主持下进行的，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同能否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有正确的领导，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民主革命时期，第一次“左”倾路线的负责人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果是以“左”倾错误取代右倾错误。王明路线站在更“左”的立场上总结立三路线的历史经验，结果是把“左”倾当成右倾批判，导致更“左”。直到结束了“左”倾路线对党的统治，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才正确总结了三次“左”倾路线的历史经验，从思想上教育了全党。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纠正了华国锋同志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后，才掌握了正确

总结历史经验、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党的历史证明，错误路线的领导不可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必须从改变领导开始，从领导集团少数人的觉悟到多数人的觉悟，通过多数人的觉悟改变主要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主流，然后在正确领导的主持下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

总结历史经验，总是在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的对比中，在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较量中完成的。从我党总结经验的历史活动看，凡是党内民主得到充分发扬时，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健康进行、顺利发展；而当个人专断盛行，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时，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出现偏差，甚至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大力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生活。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革的经验教训，先后用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提交了7个稿本，80年秋还组织老同志和高级干部4000余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使决议的起草过程成为全党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过程。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81年决议，才真正体现了全党智慧的结晶。

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对历史问题的再认识，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权威问题。权威的领导对革命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但权威不是永恒的绝对真理的化身，权威的领导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错误路线往往把某种权威捧为偶像加以崇拜，并把自己打扮成偶像的代表和化身，要求人们唯命是从。在偶像崇拜的条件下总结历史经验，必然固守“两个凡是”式的戒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以实践为标准去检验权威的领导。回顾党的历史可以看到，凡带全面纠偏性质的历史总结，都是以破除迷信为前提，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在30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

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推行“左”倾路线。要克服它是异常困难的。遵义会议排除了共产国际对党的领导层的影响，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及时正确地解决了革命面临的紧迫问题。但是就全党来说，还没有达到思想上真正的自觉。从思想上自觉地克服对共产国际的偶像崇拜，确立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还是通过42年的整风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的。有了整风运动，才有43年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才有彻底清算“左”倾路线的45年决议。再拿81年决议来看。5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不仅滋长了党内的“左”倾错误，而且使得这一错误格外难以克服。76年粉碎了“四人帮”，但是人们思想并未立即从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甚至连粉碎“四人帮”这一行动本身，还借用了毛主席的“三条指示”。所以，以后又有了长达两年的徘徊。直至1978年通过全党全国人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冲破了个人崇拜的牢笼，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得以实现，形成了81年决议这个历史性文件。

思想解放运动的目的，是使人们的思想从偶像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再教育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在两个决议制定之前，都经历了一个全党范围的持续两三年之久的学习运动，即45年决议之前的42年整风运动和81年决议之前的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种学习运动，不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是有很强针对性的生动深刻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运动。首先是针对偶像崇拜的主要

理论形态，选准突破口，即三次“左”倾路线的教条主义和60、70年代的“两个凡是”。然后针锋相对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进行论战，42年整风中是以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教条主义的学风，78年则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围绕理论论争的中心问题，选学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著和党的文件，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思想路线的端正，不但使政治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对党的思想建设发生了长远深刻的影响。42年的整风运动和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都以它们对党的思想建设的伟大贡献而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 三、总结历史经验必须把握好时机，采取适当的步骤

总结历史经验必须掌握适当的时机和步骤。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曾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⑦可是到了1981年5月再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则强调：“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⑧这一缓一急，实际上就反映了一个时机问题。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是成功的经验总结，都是比较好地把握了时机的。

一般说来，总结经验按其目的、范围和深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对特定的、具体的、紧迫的任务，而对历史的某个侧面进行局部的回顾，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以便制定出正确的对策。这是局部性总结。另一种是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实现党的基本任务，而进行的全面的有深度的高水平的总结。这是全局性总结。对于不同类型的总结，需要具备不同的条件，选择不同的时机，采取不同的步骤。

局部性总结面临的问题比较集中，时间比较紧迫，总结的范围具

体有限。在这一类总结中，最为典型的是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召开时，党和红军正处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危急关头，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成了当时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同时“‘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sup>⑨</sup>在这些条件下，会议集中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路线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为了照顾全局、争取多数，会议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问题暂不涉及，甚至在决议中还写上“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sup>⑩</sup>避免了因政治路线的争论而影响对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顺利解决。遵义会议的成功告诉我们，把握局部性总结的时机，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是什么；其次，要考虑全党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第三，对于因条件不具备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暂不涉及，留待以后解决，甚至可以作必要的妥协。遵义会议的这些经验，在以后仍被继续沿用。

全局性总结是对党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的全面工作的总结，如45年决议、81年决议。这类总结，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要解决的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问题，目的是提高党的领导核心和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影响广泛而且深远，并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进行这类型经验总结，在时机把握上，要有一个时间的缓冲过程，一个比较平稳的环境，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进行全局性总结，有一个时间的缓冲过程是必要的。在历史剧变中，风云变幻，江河浑浊，人们往往看不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本质，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历史的真相和规律才得以澄清和显现。只有经历一个缓冲过程，才能够达到稳定情绪、冷静思考，排除感情用事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如果没有一个时间上的缓冲过程，就来不及对历史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往往因为抓不住实质而草率从事。同时，广大党员的思想条件、心理条件也不具备，转弯过急，势必引起思想混乱甚至政治分裂。苏共20大评价斯大林，不考虑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给国际共运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和无穷的后患。我们党81年决议，汲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评价。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进行全局性总结，还要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内外环境。总结历史经验，首先要大家能够坐下来，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和研究问题。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忙于应付各种紧迫的任务，是难以从容不迫地总结经验的。42年整风和43年讨论党史是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的形势下进行的。81年决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政方针已经确定，组织领导问题基本解决，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的情况下进行的。比较平稳的形势和环境，是它得以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全局性的总结，必须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全面深入地总结经验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遵循人们的认识发展规律，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进行。45年决议的形成，首先从延安整风开始，经过高级干部学习党史，到最后形成决议，水到渠成。81年决议，从真理标准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开始，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创造各种政治上组织上的条件，最后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

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

#### **四、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事实，揭示历史规律，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

总结历史经验是一种认识活动，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要求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才能求是。离开实事，总结经验就失去了客观性。为了一时的实用主义的需要，肆意篡改、掩盖历史真相，不但总结不出真理性的经验，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尊重历史事实必须全面准确地再现历史。在43年学习党史并为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作准备时，毛主席领导编印了400万字的《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文件汇编，提供了最充分的历史素材。在两个决议中都用了相当篇幅再现各自总结范围的历史基本线索，以此作为分析路线是非的出发点。再现历史主要是搞清三个问题：一是搞清党的实践的社会历史环境即基本的国情。国情是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党的理论、路线的客观依据。对国情的把握，直接制约着对党的理论、路线的再认识。二是搞清当时的形势。形势是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出发点，只有搞清当时的形势，判别政策是非才有客观标准。三是搞清党的路线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践结果。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得失都是党的理论、路线付诸实践的结果；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理论路线正确与否的客观标准。总结历史经验，就是要搞清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借以分清路线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尊重历史事实，不是停留在就事论事，而是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现认识的飞跃。在党的历史上，曾经一再出现过重犯同

类性质错误的现象，往往和总结经验不深入，没有抓住本质和规律有关。党的六大批判了第一次“左”倾路线，但是没有从中国社会性质、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上总结经验，所以，“左”的思想根源未能肃清，一旦时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产生了第二次“左”倾路线。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但是王明等人却把立三的“左”倾路线定性为“右”，提出更加激进的理论 and 路线政策，使“左”倾错误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左”倾错误领导人，吃了堑又一堑，并没有长一智，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左”的实质不但未改，反而加深了。其原因就在于总结经验未能击中要害。

两个决议给我们作出了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和规律，深入总结经验的示范：首先是通过理论路线政策的具体分析，揭露其基本政治倾向的性质。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左”还是右，定性要准，弄清是“热症”还是“寒症”，才能对症下药。在历史上曾一再发生过把正确说成错误，把“左”说成右或“形左实右”，都是由于定性错误而造成了错上加错。两个决议把历史问题的定性搞准了，拨乱反正就有了正确的大方向。其次是分析党内出现错误倾向的主客观原因，揭示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把因果关系搞准了，才能找到防止重犯同类错误的办法。两个决议对错误的分析，都不过分着重于个人的责任，而着重于错误产生的因果联系的分析，真正起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第三是从正确和错误，成功和失败的对比分析中，发现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今后的实践。45年决议围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批判“左”倾错误的同时，从正面阐述和发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81年决议在全面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概括

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条基本经验。这些理论概括，对我国80年代初的历史性转折起了很大指导作用，并将在今后继续发挥深远的影响。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必须采取辩证分析的方法，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只肯定应该肯定的，也只否定应该否定的，防止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偏向。即使对王明“左”倾路线，毛泽东同志也坚持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指出他们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方面也看到他们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正确路线是没有争论的。81年决议，既肯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又指出他晚年的错误。两个决议还对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和人民群众在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创造的业绩加以分析，不因否定错误路线而否定人民群众的业绩和革命积极性。这样的分析方法，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合情合理，既有利于弄清思想，又有利于团结同志。

用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方法总结历史经验，在实践上容易导致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产生十分有害的后果。以统一战线政策为例。党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大革命后期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土地革命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都是片面的错误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不在于实行联合，而在于否认斗争。如果用否定一切的态度总结经验，就把联合也否定了，势必转向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从而使党的政策从右的一极跳到了“左”的一极。反之亦然。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历史经验，用全面性克服片面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成功地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当前我们党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

训时，也采取了辩证分析的态度。前几年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开放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实行了改革开放，而在于改革开放中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够一贯，不够坚决。总结经验教训，不是否定一切，把改革开放也否定掉，而是肯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否定同四项基本原则相背离的改革开放。这种辩证分析，反映了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 五、总结历史经验，必须排除非理性因素的消极影响

总结历史经验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同时也有非理性因素如情感、个性特征等发生作用。45年决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左”倾路线产生的原因时曾指出：“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sup>⑪</sup>这里所说的“仇恨”、“愤怒”，就是属于情感的非理性因素。这种分析，考虑到了非理性因素在总结历史经验、决定党的行动方针时的影响，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必须重视情感对总结经验的影响。情感表明主体对某种客观事物的态度，而认识则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人们在总结经验的认识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不是机械的无动于衷的，也往往带着情感的色彩。因而人们情感上的倾向性也会影响到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必须做具体的分析。

首先，要区分是无产阶级的情感，还是非无产阶级的情感。无产阶级情感以人民大众的最大利益为取向，以科学的世界观为基础，能够提高我们的革命积极性，增强我们的认识能力，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所以，无产阶级的情感对于我们公正准确地评价历史、总结经

验，是重要的动力和基本的立足点。而非无产阶级的情感，则由于其利益的狭隘性和情绪的不稳定性，妨碍人们正确地评价历史、总结经验。因此，45年决议深刻分析了“左”倾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分析他们在政治情绪方面的种种表现，以引起全党的警惕。

其次，要分清是同科学的理性相结合的情感，还是盲目的失控的情感。强烈的情感如果不同理性相结合，会发展为失去理智控制的冲动，不能冷静地总结经验估计形势而迷失方向。50年代后期以后，在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时，常有一种笼统的提法，“要保护积极性”、“气可鼓而不可泄”。而没有深入分析这种积极性是什么积极性，这种“气”是一种什么情绪，是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还是非无产阶级的积极性，是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积极性还是反科学的积极性，是盲目的破坏性情绪还是自觉的建设性情绪。这种不加分析地予以保护，就等于取消了对错误倾向的严肃思想斗争，取消了实事求是的总结经验，使党在“左”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这实在是深刻的教训。

总结经验还必须排除其它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如前所述，带全局性的高层次的总结经验，一般是在领导层中进行的，因而领导成员的地位、个人修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在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总结经验，一部分人提意见可以，另一部分人提意见则要追查动机，自己作点自我批评不失为开明领导，别人批评则视为对自己尊严的冒犯；轻描淡写的批评可以成为民主的点缀，尖锐深刻的批评则是不可容忍的。1959年庐山会议的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是非理性因素干扰了理性的思考，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非理性因素对总结经验的消极影响，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特